

前 言

年届古稀的我，一直思谋着想写点什么，这也许是我这把年纪还能做的事。我的前半生经历坎坷，命运多舛。往事如烟，但“后遗症”仍伴随我这后半生：经常恶梦连连，惊恐、呓语，甚至在梦中和邪恶搏斗从床上滚到地下，常令我的妻子寝不安席。为安全起见，她坚持要在我的床边安放一张靠背椅，我服从了她这样的安排。数十年来的许多事情已淡忘，要重新追忆，费心费力；有些事要定格于笔端，也于己于人都是不快的。可是，我决计要写。古人云：“七十曰老，而传”（《礼记·曲礼上》），这里的“传”，指“传给子孙”。我没有什么宝贝传给后人，写这本书，只是留点真话，让人们去深思而已。如今，坐在微机前，敲击键盘，回首数十年的往事，千头万绪，纷至沓来。

我是1956年参加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被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录取的，所在班级为新闻专业56-2班。次年10月，在学校整风反右派运动中，我被划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58年9月，北大新闻专业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我也成了人大学生，所在班级为新闻系1956级13班。在这个社会里，许多事情总是颠三倒四的，想当年，人大在全国高考前招生，对报考新闻系的考生政治条件要求很高：中共党员或优秀团员。我是非党非团，无缘参考，就参加全国统考。谁知道，两年后，我却是以一个受到留校察看处分的右派学生身份，走进人大新闻系的。又过了两年，我大学毕业，仍戴着沉甸甸的右派帽子被“发配”到宁夏，在那里度过了十多年的苦难日子。

整风反右后，我吸取了“教训”，之后的近二十年日记中断了，信件往来少了，可稽查的资料十分有限，况且，从青年走向壮年，再走向老年，记忆力的衰退是不由人的，可我还是力求写出些有用的东西来。2003年8月，同班的贺永新同学曾在给我的信中说：“确实，4年大学生活可能带给你的更多的是伤害，但不论怎样，毕竟是一段人生经历，写下来、留下来也算昭示后人的教训；否则，我们这一代人不少无谓的沉重付出就会因为消失在默默之中而更显沉重了。”他的这一番话是对的。因为“一个健忘的失忆的个人是可悲的，一个健忘的失忆的民族是危险的。应该记住的要刻骨铭心，不该忘记的要没齿不忘。”（邵燕祥：《淡然忆旧中的无边沉重》）我主张，应该为今天和将来重新审视和反思过去。我还想，尽我的可能，从我记事开始写起，把我的经历，一塌刮子都写出来。我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若干年后，想必也要赤条条地离开这世界，自忖这辈子没“负”天下人，有什么“隐私”不能见人的？至于天下人中有负我者，上帝还是允许他们忏悔的，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近读张中行先生的《流年碎影》，其中有一段话是像鼓励我去写的：“试想，街头巷尾的赵大爷和钱二奶奶，碌碌一生，也有情，经历了不少事，如果通文，也能写，为什么就不能把自己的经历和情意写出来？而且，如果写出来，其价值和可读性就一定不如出于名人笔下的吗？再退一步，假定确是不如，至少我想，既然人在受生方面是平等的，任何人都都有为自己的生涯留些痕迹的权利，所谓争取不与草木同腐是也。”

史学大师余英时教授认为：“从我们学历史的人来看，这种回忆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来源。”“从历史的观点看，许多人写回忆录或者自传是一个重要的现象，这个现象表示中国已经转入另一个阶段了。”（余英时：《可喜回忆录和自传增多》）

当然，我得认真地写，我也不能像某些“名人”对往事去那样“随想”，我得写点值得人们去琢磨的东西。我一介草民，没有跟大人物跑码头、受大人物亲睐的经历，却有着长期和社会底

层共命运的故事。作家萧乾说：“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有责任给后世子孙尽多地留几面镜子，希望他们了解点历史，懂得路是怎么走岔了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大家都来回顾一下那些难忘的日子。回顾，是为了不再重演。”[文洁若：《我与萧乾》枕边私语(代序)]可以说，忘记历史的人，必将重复历史。捷克的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指出：“民主与专制的斗争，在某种意义上便是记忆和遗忘的斗争”。上世纪80年代末，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夫人就说过：“专制政权让人们遗忘他们的罪恶，我们应该拒绝遗忘！”诚哉斯言。是的，我们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要拒绝遗忘、捍卫记忆，让那些我们曾领教过的人类的假、恶、丑统统暴露在阳光下，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那时，我才14岁，但已学会唱一首歌，那就是《团结就是力量》。歌词中有这样一句：“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至今已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句话仍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但愿我们能早点迎来自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的，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我将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写出一个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北大学子的回忆录，他的苦难命运是和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苦难同步的。这本个人回忆录，是“野史”，但应该是“信史”，相信它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